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研究报告】	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上）	郭 建
【学术争鸣】	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	小 鹰
【亲历者言】	毛泽东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	徐景贤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报告】

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上）

· 郭 建 ·

〔本文曾以《“造反派情结”的缘起、延伸及影响》为题首发于《思想》季刊第32期。这里发表的是作者修改、补充后的新稿。——编者〕

在多年的文革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始终令我感动，那就是：从事文革研究的中国学者大部分都不是在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受过专门训练，将史学研究当作职业的专家，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一般都另有所在，从世俗的职业观来说，文革研究不过是他们的业余项目。但是从人对意义的追求这个角度看，文革研究却是他们真正的兴趣所在，并自觉不自觉地被他们视为一种使命。英文的表达可能更清楚一些：前者是 job 或 profession，后者是 vocation 或 calling；前者是谋生的手段，后者是人生的召唤或天职。

这些“业余”文革专家多半都是在青年时代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那些年的经历如此刻骨铭心，在记忆中挥之不去。为了让自己搞清楚当年灾难的真相和前因后果，也为了抗拒人为的历史遗忘，挽救国人的集体记忆，以便后人仍能以史为鉴，不会重蹈覆辙，这些学者在他们专业之外的文革研究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们大部分都是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都曾对所谓的阶级敌人义愤填膺，为某种理想而热血沸腾，后来却为自己上当受骗而懊悔，也在幻灭中开始独立思考。

直接参与、投身文革的经历是他们研究文革得天独厚的条件，读他们的著作常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真切、地道、在行，以至于阅读有关文革的著作，读者经常可以从字里行间猜出作者的年龄。但是，个人感情的沉迷有时会影响对他人境遇和全局经验的理性思考和判断，深深的卷入也往往会因为“身在此山中”而产生观察上的局限，所谓“造反派情结”就是我在不少有关文革的著作中隐约感到的一种局限。作者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同道和朋友，我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资源和智慧，但因为篇幅的限制，我将免于说项，专注于提问和批评。

◇ 造反派情结与“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

的确如徐友渔所说，文革中有过“形形色色的造反”，“造反”这个词在文革语境中有多种含义。〔1〕我这里所说的造反派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指在1966年10月（以《红旗》13期社论及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明显标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兴起并壮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红卫兵）。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造反的具体目标和意义是什么。我这里所指的造反是文革中的第二次造反。第一次造反，以毛泽东“造反有理”语录（1939）的重新发表（1966年6月5日）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起点，并没有按照毛所设想的方向发展。在第一次造反浪潮中，后来被称为“老兵”的“红五类”红卫兵打着造反的旗号在学校里批斗校领导，迫害老师，到社会上破坏传统文化（“破四旧”），残害那些在政治上被划入另类的无辜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在文革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于8月9日发表以后，红卫兵也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此文件明确界定的文革主要打击对象，即“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因此，1966年秋天兴起的造反运动实际上是文革的第二次启动。这一次造反派确实听命于领袖，把矛头指向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很快被称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老红卫兵已经落伍，趋向保守，其中的一些高干子弟已经因为父母被清洗而怨恨文革，准备成立挑战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而此时的造反派组织则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很多在第一次造反中被老红卫兵和工作组迫害的学生和老师。1967年上海造反派发动“一月革命”，奉旨夺权，此后曾出现过一段老干部抵制文革的“逆流”（当时称“二月逆流”），其间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受到打击甚至镇压。但由于毛和中央文革派的支持，他们多半东山再起，最后作为包括军代表和老干部在内的“三结合”权力机构的一部分进入文革新建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研究文革，研究造反派，造反的正义性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文革期间，毛泽东支持、利用造反派打击政敌，冲击国家各层权力机构，然后，以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为标志，开始抛弃、放逐甚至镇压（如1968年“七·三布告”前后在广西）造反派。周恩来不喜欢造反派，曾以乱军和破坏外交的罪名削弱造反派的后台力量（使已经开始对造反派不听话感到烦恼的毛泽东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逐出中央文革小组，送进秦城监狱），并借“清查五·一六”打击造反派领袖人物。文革以后，造反被否定。在清查“帮派体系成员、骨干”和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的运动中造反派头头及其激进成员被整肃，官方媒体称他们为“四人帮”马前卒、打手、社会基础，常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之类尚未脱离文革语境的丑化描述。文革后民间的文革研究在对造反派的评价上多半以较为客观的描述挑战官方结论，如在香港出版的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和唐少杰的《一叶知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官方史学针锋相对、更具当事人主观色彩、从正面肯定造反的文章和专著，这样的主张中，“人民文革”或“两个文革”的说法似乎最有影响。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王希哲。1974年在赵紫阳主政的广州曾出现过一篇借批林彪而质疑文革、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王希哲是三位作者之一。王在七十年代末就说过，实际上有两个文革：一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个“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3〕此后，郑义推出群众利用毛的号召而“趁机造反”的看法，“两个文革”的内容于是更为具体化：“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一个文革，统治者的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攫取权力；一个文革，被统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条件，反抗封建特权和政治的压迫。——这是两个互相利用、同时又互相冲突的文革。”〔4〕刘国凯在文革期间对这个问题就有所意识，起初他称

其为文革的“两条线索”，后来便更明确地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而与此相对的官方文革，其“施行者是共产党的整个国家机器，毛及其所要清洗的党内异己势力均属其中。这个机器的延伸物——保守派（这是个历史名词。更贴切的称谓应是保党派、保权派、保既定统治秩序派）亦是官方文革的施行者。人民文革的施行者是造反派群众组织。”〔5〕

“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例如，徐贲认为：“人民文革”夸大了极权统治下个人反抗意识的自觉性，并将文革中的某些“杂异因素”等同于抹杀杂异的“人民”。徐贲在《群众和“人民文革”》一文中写道：“文革中确实存在多种个人动机因素，这些因素中也确实有许多与冠冕堂皇的文革话语不相一致，如对上级领导的怨恨，对不公待遇的宿怨，个人泄私愤，乘机报复，以至发泄对共产党或政府的不满，等等。但所有这些怨愤的发泄对象都是极为局部的，根本不可能明目张胆地相互联系为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运动’或‘革命’。将那些局部的怨恨、报复和发泄上升为‘人民文革’是不妥当的。”其结果是，“就在破坏那个一元官方文革的神话的同时，‘人民文革’不知不觉地又制造出另一个一元的另类文革的神话。”〔6〕

我同意徐贲的看法，当年的造反派都是奉旨造反，在领袖的号令之下斗争所谓“走资派”，被领袖所“运动”，并没有诸如“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之类的意识。当时的极权主义的统治和渗透已经达到极致，很难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更不用说自觉的社会运动了。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趁机”为自己争取权利、并几乎成为群众运动的事件，就是1966年冬天很多临时工、合同工组织起来要求转正的活动。但这一活动很快就作为“经济主义黑风”的一种表现被压制下去了。

我还觉得“人民文革”论的提出实际上正是“造反派情结”的反映。提出“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当年的造反派。他们当年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为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奋斗，在发现自己被欺骗、理想幻灭之后，他们仍然愿意在过去的黑暗中找到一些亮点，不愿意完全否定造反年代的自己。再说，人的记忆并不可靠，不自觉的选择性是常规，对青年时代的回忆更是如此，甚至连痛苦的记忆都有可能蒙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此乃人之常情，在心理学上也有解释，但未必有利于我们记忆文革，反思文革。

而且，“人民文革”论并没有摆脱文革派性思维：按照刘国凯的说法推论，造反派是人民，而同样是群众组织的“保守派”就不是。

郑义在《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40周年》一文中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官方学者很愿意把文革描写成一场大疯狂，但这是经不起讨论的。我们很难想象，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的人民在一瞬之间患了集体疯狂。”〔7〕为什么很难想象？想象上亿人的集体疯狂，而且想象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这的确很不容易。但事实又的确如此，需要我们勇敢地面对：当理想与某种从一个观念推导出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得以实施的时候，“人民”就可能集体疯狂（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专节讨论）。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世界一流文化教育水平、而且原本有多党民主体制的德国发生了，在六十年代经过十七年一党制政治洗礼的中国也发生了。从理性的角度看，当年卷入文革狂潮的中国人确实不可理喻，确实疯了。我觉得，敢于想象并承认这一点比回避或否认它更有利于我们反思文革。

◇ 文革造反的价值取向及其在当下的涵义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造反派情结还显示在一些当年的造反派与毛泽东以及被毛打击的老干部（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微妙关系上，这个老干部群体在如今造反派学者的研究著作中一般被指称为官僚集团或旧政府官僚。尽管在意识层面，在理性层面，毛对文革灾难应负主要责任这一结论如今在造反派学者中已是共识，但由于在文革造反时期，他们全心赞同过毛的激进理念，而且毛使他们相信那些“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老干部是共同敌人，后者支持“红五类”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压制甚至迫害他们，是毛决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解放”了他们（于是，造反派与老干部从此不共戴天，而毛则成了他们的恩人。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两句歌词当年的确使很多人落泪）；再说，文革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阵营确实不喜欢造反派，有机会就会打击他们；文革后以邓小平为首的这一阵营在诸如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中清除权力机构中的造反派，其中有的还被处分，甚至判刑；同时，文革后的官方史学和官方媒体也的确将造反派这个群体概念化，脸谱化，甚至丑化，以至于在如今的主流媒体和大众意识中，文革灾难的产生就是因为上有“四人帮”，下有造反派。由于这些观念上的错综关联和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很多当年的造反派仍然把老干部阵营当作真正的对立面和迫害者，而对未能得以推行其文革理念的毛泽东本人仍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旧情”（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才更是非理性的情结）。廖亦武在讲他自己的狱中经历时，曾提到一位同室的前造反派头头，此人很可能是在清查“三种人”的时候被判刑的，他认为邓小平背叛了毛泽东，一看到有关邓小平的文字就痛骂不止，用最下流的语言做旁批。（8）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虽然被毛训斥、抛弃，却仍对领袖感激涕零。这种情况都同造反派情结有关。

对于造反派在理念上和实践上与毛泽东的关系，周伦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有颇为细密的专章讨论。他描述了毛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或云“造反精神”）和“纯粹无产阶级化”的社会理想（或云“乌托邦”），认为文革就是以前者推行后者的具体实践。而“年轻人青春期特有的非制度化倾向”和“下层民众反抗政治迫害和等级歧视的冲动”（尤其是文革初期在血统论影响下学生遭到的歧视和迫害。毛说，那是与他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便构成了文革中“民间造反行动与毛泽东政治行为之间的两大契合点。”（9）

周伦佐以上的分析基本符合当时的情况。他还说，造反派当年的确认同毛的社会理想。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为实质性的文革造反的价值取向问题，也就是在理念层面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周伦佐提到了，但没有深入讨论。他写道：“联想到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内‘修正主义头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仍然忧心忡忡地再三告诫‘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未消除，联想到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人民日报》4月18日那篇名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将邓小平比喻为‘匈牙利事件’中党内改革派领袖‘纳吉’之事，我们不禁要追问：在‘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虚假言词背后，毛泽东真正要防止的究竟是什么？答案非常明确：毛泽东所要防止的，正是1979年后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10）

其实这是一个最为明显、最值得造反派反思的问题。我说最为明显，是因为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指出，文革的主要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他们的权，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文革前中共领导人中并没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与毛泽东在治国理念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确有分歧。在“三面红旗”政策造成大饥荒悲剧之后，处于中央领导核心第一线的刘少奇等人为恢复农村经济曾推行诸如“三自一包”的宽松政策，也许毛已经在其中看出资本主义的端倪；同时，毛也看到了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经济政策上的松动。不管怎么说，事实是，毛泽东当年担心的、预见的、并用文革来阻止的事情发生了：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接受了市场经济，导致经济腾飞，虽然没有出现自由

资本主义，但毕竟出现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与此同时，毛的阶级斗争理论被抛弃，大约三千万被称为阶级敌人的政治贱民被解放，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应该承认这是历史的进步，而这一系列政策的制定者，多半是在文革中挨整的所谓“走资派”，他们既是文革造反的打击对象，又是文革后整肃造反派的老干部。

能否超越历史的局限和恩怨，冷静地反思造反的正义性问题，这对于造反派来说，至今仍是一个挑战。在当今的很多研究著作中，对毛泽东的对立面的指称多半是含“官僚”一词的各种说法（如官僚集团、旧政府官僚、官僚阶层、官僚阶级、旧官僚等），“走资派”这个称呼已经很少用。我觉得这样说脱离了文革的语境，有自觉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之嫌。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心理上的：说自己曾经反对“走资派”，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早已决定宁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不要“社会主义的草”了；但是，如果说自己当年反对官僚集团，这总不会错吧？至少不全错。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造反派学者受国外理论的影响，在东欧有米洛文·吉拉斯的《新阶级》，在西方有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官僚体系的左派文化理论，一说反官僚，就像是和世界理论界接轨了。但问题是，这种说法等于把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文革派与官僚和官僚体系对立起来了，好像毛不是体制中人，好像文革真是要反对官僚统治，给民众以自由和民主权利，而不是先破后立，在打碎国家机器、整肃各层干部之后使领袖的一元化领导更为稳固、更为彻底。这种说法，如果不加详细解释，很容易像“新左派”那样无视中国官僚体系同西方民主社会官僚体制的本质差别。

关于“走资派”，我觉得西方学者常用的称谓更为中性、客观、准确，即中共领导层的务实派或温和派，与其相对的是以毛为首的激进派或文革派。研究文革，讨论造反的正义性，研究者势必要对这两派官僚加以比较，并在比较基础上得出以现实为基础的价值判断。文革派的激进、极端、偏颇的理想主义和非理性是导致“集体疯狂”、造成文革灾难的主要原因。而务实派则相对温和、现实、理性，没有这些人，国计民生都很难维持，甚至会出现红色高棉那样的极端局面。务实派中也有派别，刘少奇和邓小平与毛本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也可以很“左”，很专断，但五十年代初刘少奇一度坚持相对温和的新民主主义，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以后推行宽松的农村政策；邓小平在文革后期抵制文革，搞全面整顿，文革结束后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些举措都显示出他们理性、现实的一面。周恩来从来就不是毛派，但很早就知道中共事业成功的领导者非毛莫属，只是他虽然“党性”极强，力图紧跟毛，却总也跟不上。延安整风时（即刘少奇建议中共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理论的时候）周作为“经验宗派”之首被整肃。大跃进前夕还因为同邓子恢等人反冒进、减缓农业合作化速度被毛批评“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11）文革动乱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教育、外交等各方面的局面主要靠周恩来和他手下的一批老干部维持。在能够自保的情况下，周还保护了很多。林彪事件后，周提议反对极左；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后，周提议部分学生可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直接选拔；邓小平再次出山后，周全力支持邓的全面整顿。这些成功或不成功的动议和措施起码反映出一个人面对现实的态度和一个领导人对国事的慎思，与文革派的极端和非理性形成对照。在文革后期，中国的大多数人对这一点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已经把结束文革、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务实派代表人物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身上，这种民意终于在1976年的3月末和4月初以民主运动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被文革派称作“天安门反革命动乱”的四五运动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抗议模式：以悼念的名义向权力示威。至此，文革虽未结束，却已经在大众的心里彻底破产，人们此时在务实派和文革派之间所作的历史的选择自然也就否定了文革造反的正义性。

然而，这个在1976年已经在全国基本达成共识的结论，如今正在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历史遗忘的挑战：近些年，由于主流话语似乎从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初所作的全面否定文革的决议退步，试图淡化甚至扭曲历史记忆，如今人们对文革的记忆或了解往往是空白或混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文革的了解就更少。其次，改革开放，

搞市场经济以来，虽然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大量财富被政府官员、官商及其子女侵吞，贫富差距迅速拉开，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引起民愤。于是，在集体失忆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将文革年代的中国想象成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平民百姓可以造反，斗争贪官污吏。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也越来越吸引人了：毛曾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并预言“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还说这些人掌权会打毛的旗号，但人民不会答应，人民起来造反的时候也会打毛的旗号，云云。当下中国的发展似乎正在验证毛的预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见端倪的毛崇拜回潮也正因为蔓延，甚至泛滥。而卷入这股回潮的人很多是当年的造反派。徐友渔在一次报告中提到这一现象，特别提到薄熙来主政时的重庆。当年造反派群众组织中的两派打得不可开交，如今却一致拥护以唱红打黑召回文革幽灵而闻名的薄熙来。当年造反派的领袖人物尤其活跃，他们并没有认为当年奉旨造“走资派”的反有任何错误；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为当下的现实越来越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就是有“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还整肃当年反对他们的造反派头头，打击报复，秋后算帐……〔12〕

显然，文革结束四十年后的中国，面临着一个向四十年前已经被民意否定的文革倒退的尴尬局面，与这个局面直接相关的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问题：文革后吸收资本主义因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毛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底哪一个更好些？即便毛的预见被证实了，我们仍然可以反问：那又怎么样？资本主义的苗可以长成庄稼喂饱肚皮，社会主义的草却会饿死人，不是吗？当然，“资本主义”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在现实中它已经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代表毛泽东想象中的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实际上是在民主宪政体制之下推行市场经济，个人权利受到保障的福利社会，其中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尽管从文革结束至今，中国仍然实行一党制，但改革开放毕竟使中国摆脱了文革式极权统治，不再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治国纲领，解放了政治贱民，放弃了计划经济和造成大饥荒灾难的人民公社，接受了市场经济，向以西方民主制度为代表的现代社会迈出了一步。

面临向文革退步的危险，讨论文革造反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一个很切近的题目。研究造反派如何被整肃，如何被丑化，分析一党制的起源、沿革、现状，这些都是当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但面对眼下的历史遗忘和文革回潮，一方面有大众的仇官、仇富、怀念文革的情绪，一方面有知识界新左派对文革的重释和推崇，两者对文革的误读都建立在对造反正义性的曲解上。因此，有造反派背景的学者如果能超越造反派情结，敢于否定自己，反思造反年代的错误，这对国人认识文革，以史为鉴，免于重蹈覆辙，将会有更直接的帮助。

◇ 造反派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非正常死亡的高峰，正如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论证的那样，美国文革史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也支持这一论点：第一个死亡高潮出现于1966年夏天红卫兵自己命名的“红八月”或“破四旧”运动。〔13〕“红八月”始于8月上旬，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老师在8月5日遭女学生殴打，成为北京文革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教育工作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革命师生队伍”，接受红卫兵袖章，并对献给他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说“要武嘛”以后，死亡人数，包括自杀人数陡增，仅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死于非命。这一段红卫兵的施虐在北京持续到9月上旬，在外地还要再长一些。

第二个死亡高峰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期间，三结合的革委会掌权时期。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时讲话，首次提到“清理阶级队伍”的概念，清队作为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应该是起始于1967年12月，其高潮期是1968年。这场运动没有正式的终结，因为后来它与1967年8月开始

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和1970年1月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混在一起了，一直到文革结束。现在文革史家谈及清队，一般都指1968年到1969年那一段时间，此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计。

清队是文革中最残酷的运动。王友琴通过访谈，对近千文革死难者个案进行了深入考察之后，得出结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最为阴暗恐怖的季节。与1966年的‘红八月’杀戮相比，迫害变得更加有系统也更加旷日持久。”〔14〕丁抒在研究大量地方县志的基础上对清队的罪恶得出基本上一致的结论：清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阶段。除了战争年代和一九六〇年毛泽东制造的大饥馑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队’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就全国而言，‘清队’中的非正常死亡超过文革中任一阶段。”〔15〕可见，清队运动乃文革最惨烈、最无人道的阶段。

尽管如此，除了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中的数百个案研究和丁抒的一篇长文以外，至今并没有以清队为重点的研究专著问世。同时，我还看到另一个现象：很多文革研究著作中提到清队时都说：虽然造反派代表和军代表、老干部代表一起进入三结合的革委会，但真正有权的是军人；造反派不但无权，而且军代表还和老干部一起借这个运动的机会迫害造反派。例如，周伦佐称这个时期为“军人掌权时期”，“从这时起直到‘文革’结束，北京及全国所有大专院校发生的迫害知识分子事件和制造的冤、假、错案，主要责任人不再是造反红卫兵，而是‘工宣队’和‘军宣队’。”周伦佐承认，在革委会中造反派代表的比重并不小：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初常委以上成员名单显示，群众代表约占百分之四十一；四川西昌地区（周所在地）革委会中造反派代表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但是，周伦佐说，造反派代表很少能成为有决策权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主任一般也由军代表担任。〔16〕据此，周伦佐开脱了造反派在清队运动中的责任，并将造反派与“红八月”中的施暴者加以比较，认为“红卫兵运动中只有保守派残酷迫害弱势群体，造反派冲击的却主要是官僚阶层”。〔17〕

在对文革造反的性质的判断上，陈益南与周伦佐的说法类似，即民众反抗官僚。〔18〕但他对造反派在清队运动中的角色的讨论却更接近现实情况：各级革委会刚刚成立时，正在执行“支左”任务的军人的确权力很大，所以，革委会主任多半是军代表；在这个初始阶段，老干部代表由于刚刚挨过批斗，心有余悸，处于弱势；造反派群众组织人多势众，那时还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所以在临时权力机构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在多数单位，这种格局一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才开始被打破：九大以后，处于瘫痪状态的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老干部的势力渐强，造反派被逐渐挤出权力机构（上海除外），有些造反派领袖在持续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和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整肃，造反派短暂的掌权阶段也就随之结束。陈益南的结论是：“‘造反派’掌有权力之时负有历史责任的主要事情，大概只有一件。那就是1968年间全国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9〕

我同意陈益南的这个结论：造反派手中有权的阶段虽然不长，但恰好包括清队高潮期，所以对清队应负相当的责任。当然，由于各地各单位文革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方造反派的某一派占压倒优势，清队的开展就不会像1968年夏天出现“百日大武斗”的清华大学那样受影响，而像北大、清华这样派性纠纷激烈的单位，清队运动的高潮就会来得晚一些，在毛泽东接见五大红卫兵领袖、工/军宣队进校之后。如果说北大和清华的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和蒯大富就因此对清队没有责任，恐怕也不符合事实。例如，季羨林在《牛棚杂忆》中记载1967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那正好是在江青讲话三天之后，应当是清队的开端；季羨林和很多北大同事在1968年6月18日被批斗，那也正是在清队期间。

在我父亲任教的北京农业大学，没有能同造反派组织“农大东方红”竞争的对立面，所以清队期间一直是造反派掌权，“东方红”头头冯兴旺从1967年到1970年一直任农大革委会主任（文革后编的农大校史称他为校长）。因为没有武斗的干扰，农大的清队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的，高潮是1968年春末夏初。清队期间被迫害致死的有16人，4、5月间自杀的人最多。我家第二次被抄（第一次是1966年的“红八月”期间），我父亲被带走隔离审查，是在1968年4月12日深夜。冯兴旺执政期间，农大革委会里自然也有军代表和老干部，也许军代表比冯兴旺这个学生权力更大。但是，清队任务的具体执行者，即“专案组”成员，包括来抄家的人、审讯逼供的人、参加外调的人，都是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所以，即便革委会的大权握在军代表手中，军代表是外来人，对学校或企业事业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了解而且人数很少，不可能参与很多具体的专案工作，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做的。在我母亲任教的农大附中，情况也如此。据我了解，北京大部分的学校也是这样。所以，即便造反派没有多少权力，对清队运动他们仍然难辞其咎。

在近期的一些造反派文革研究著作中，与回避清队责任的倾向相关联的，还有另一个现象，那就是一方面批评官方史学和官方宣传过分强调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苦难，一方面着重描述造反派如何受迫害，甚至把造反派说成是文革中受迫害最重的群体。例如，秦晖说：“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不是死在造反派存在的‘乱世’，而是死在造反派被剿灭的过程中和剿灭后造反派不复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中的双方‘内战’，而是死于‘有领导有计划’的专政机器对全无反抗能力的弱势者的大规模虐杀；不是死于党政在‘造反’中瘫痪的‘无政府状态’下，而是死于‘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下。一句话，他们不是死于‘造反派’之手，而是死于‘维护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文革前军人和官员主导的政权——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名义上是‘军、干、群三结合’政权。”（20）

（未完待续）

~~~~~

## 【学术争鸣】

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

· 小 鹰 ·

我不赞成杨继绳先生的“文革反‘官僚’”说，或钱理群教授的“文革反‘官僚政治’”说，因为它们不符合事实，也歪曲了毛泽东自己发动文革是要反“走资派”的本意。

文革的最大“成果”，就是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今天无论是谁，要否定文革，亦或肯定文革？都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该不该“打倒刘少奇”？

我们现在应当如何给刘少奇定性呢？他是个“官僚”？还是个“走资派”？或者，如官方叫你找不着北的说法：“毛泽东和他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扑朔迷离”，使得一些人，对刘少奇采取抽象地肯定与同情、具体地否定与贬损的矛盾态度。

因此，刘少奇是今天“研究文革”和“反思文革”时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那么，文革中的毛、刘之争，他们到底争的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个在道路和方向上的“基本分歧”，从建国一开始起步时就存在，即走“社”，还是走“资”？此后十多年来，正是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军事各个领域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爆发。

“走资派”刘少奇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我是少数替他说几句话的人。在《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socialism.html](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socialism.html)）一文里，我详细讲述了我的理由。

近来，有人质疑道：“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胡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2016）（见本刊zk1702c）这里，我只以建国初期的两件事来具体谈谈。

由“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混成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凶恶、更加反动的“社会主义”，它在中国近卅年的实践使百姓深受其苦，使国家深受其害。

然而，历史上“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必然会失败？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是反动的？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马、恩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马、恩反复强调“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而在封建社会里，并不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三个前提条件，它们还“正是尚待争取的”。

不理解这一点，就是所有后来企图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步法”都遭到惨败的根本原因。

应当指出，刘少奇在这一点上曾是十分清醒的。

1951年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这末一句评语，深刻地点到了毛式“社会主义”的要害，彰显出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功力。显然，刘少奇并不害怕农村中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也不否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基础”。

在同年同月刘少奇又为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内容提纲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其中他更勾画了一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和图画。

他认为首先要长期保持“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即，除了国营经济“会发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要发展”，“个体经济也会发展”，“合作社经济也会迅速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会要增加”。刘少奇估计，这个过程大约是十到二十年的时间。此后才是，“第一步实行工业国有化。但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能国有化。这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有产者富农、以至中农。”“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与发展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地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在农村中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但同时“应有时间给中农去动摇和考虑（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体化的时间在一片地区可能延长几年，才能达到绝大部分农民的集体化，剩下少数个体农民也让他单干。”

在刘少奇看来，“进入社会主义，主要的是这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还要一先一后，即先实现工业国有化，而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农业的集体化依赖于工业国有化。这是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倚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

刘少奇的这些思想，显然是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尖锐对立。刘这里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明确而又具体可行的建国纲领。读者不难想象，如果当年真的能按这一纲领实施，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会比“亚洲四小龙”要来得更早。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是什么？可见，毛日后给刘戴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非“空穴来风”。

因此，毛泽东当即就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讲话。毛以党内“家长”的身分否定了刘少奇的这个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主张，同时立刻下令全国，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开始大规模地推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运动，全面展开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步法”跃进。

以上的“批示”和“讲课”这两件事，便是被许多人忽视，而我很看重的毛、刘间的“基本分歧”所在。它们对于认识以后的毛、刘路线斗争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

今天值得回味的是，几乎与刘少奇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1951年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1953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长相当突出。虽其生活水准终究无法真正趋近于西欧的水平，但是显然超过其他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后来铁托也被毛泽东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然而，除了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注〕政策后有眼可见的成效之外，铁托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刘少奇“走资派”路线有效的一个“旁证”。铁托做了刘少奇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

当然，你可以说，刘少奇最后还是要搞“集体化”，“本质都一样”。但，第一，这起码不是“官僚”与“反官僚”之争，第二，路总得一步步走，如果他五十年代不搞“合作

化”，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力发展了，事情就可以起变化，而百姓至少可以过些安生的日子吧？

在今天看来，“共产主义”自然是“无稽之谈”，就连恩格斯自己后来也承认，历史表明他们错了，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看法的人，都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封建专制的中国能够按照马、恩所说的，把“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先搞起来，又有什么不好呢？

那时中国要有个公众拥戴的“华盛顿”，带领大家走彻底的资本主义道路，那当然好，可是找得着吗？就是找着了，又有多少人能理解？现在说这些话的一些“明白人”，那会儿不是没有出生，就是幼于弱冠之年，还不足以堪当此大任。不过，当时中国倒是有个刘少奇，1951年2月28日在北京市人大会上讲：“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1951年3月在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又明确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刘少奇信守共产党与众多民主党派共同缔结的建国纲领。

可是，如果后来的“精英”，哪怕是在70年代末讲了刘少奇在50年代初的见解，到今天恐怕就会力争自己的“英明远见”吧？现在一些“史家”对慈禧和袁世凯尚且都“体贴入微”，要对他们“有所肯定”。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今天就舍不得给刘少奇一点credit？反而对他那么苛求，说他“没有坚持斗争到底”，“心里想的，不算数！”，说他搞“包产到户”，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分田到户”才是！”，“他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够好！私有制要永远不能触动才行！”，“即使当年按刘少奇的蓝图搞，我国经济二十年也起飞不了，那是要国外投资才行啊！”

然而，如果这些人回到50年代初的中国，不妨扪心自问，有几个人会有刘少奇那类想法和说法的水准？有几个人敢于讲出“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等主张来？又有几个人能读懂他，为什么要说资本家“剥削有功”？相反，直到今天，甚至还有人根据他这句话，在大骂刘少奇“自作孽，不可活！”俨然一副比毛泽东更恨“走资派”的样子。

现在一些“学者”又喜欢用党内的“务实派”替“激进派”“收拾残局”，或者，以“好人”替“坏人背书”，最后与“坏人同流合污”等含糊不清的话语（胡平），来唯象地淡化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这实在是看不清事情的本质，也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反显得书生气十足。

我认为，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顽固地推行专制独裁的“封建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举，也是为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事，其结果让中国倒退，走入黑暗。而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以及所有为其“摇旗呐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新民主主义”，这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刘派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的现实，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

在《“文革”问答三》（[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一文里，我也谈到最令主张文革“反官僚”说者“义愤填膺”的“官民矛盾”。

和杨继绳先生一样，我这里也不谈什么“毛泽东个人道德操守”，我只想问一句，那时百姓的怨言怒气或“官民矛盾”，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

从解放初期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始，从“反胡风”、“反右派”，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反右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大抓“阶级斗争”，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老毛干的吗？但为什么到头来，文革中反倒是刘少奇因所谓“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为他反对过“合作化”、搞了“包产到户”、搞了“物质刺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吗？这说不通啊！这还是老毛的说法耶。

1960年7月26日，湖南女工、贫农女儿刘桂阳在北京中南海北门外，双手高举纸牌抗议，上面写道：“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和“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刘桂阳因此被判入狱五年。刘少奇知道后批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撤消判决。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之后，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又被地方军管重新收监，维持原判，并加判有期徒刑五年，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才被平反。

记得大约是1964年，我也听说农村中有过这样一副春联：上、下联分别是“二三四五”及“六七八九”，横批是“社会主义好”。当时校方党领导告诫我们，这是恶毒讽刺“社会主义”缺衣（一）少食（十），这是“阶级斗争”！但难道那不是事实吗？谁好谁坏，农民心里明白得很，毕竟横批不是“三自一包好”吧？

当时这些公开的抗议和讥讽，以及更多人私下的议论及腹诽，都是指向了“谁”和“什么”？难道我们现在还分辨不清楚吗？

因此，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而且，我们是讨论文革的是非问题，也不要把现在的“官民矛盾”掺和进来，说什么文革那时就反了贪腐和特权。

自62年到65年，毛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似乎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你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的“上山下乡”、“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国吹捧。总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不亦乐乎？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青春荒废的一代人也都“无怨无悔”吗？恐怕正相反。这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我们这里还没有谈文革的66年到68年，那是个变迁过程，不是稳态。就算它不能定性，但毛路线下的那两年，又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有几个人对它满意？总之，毛、刘的路线有没有区别，各人自己应当心里有数。

冤有头，债有主，我国的“官民矛盾”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这要做具体分析，对共产党、对毛和刘，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颠倒是非”！

是的，杨继绳先生和钱理群教授都是名人，他们“反官僚”的“文革观”受到很多人的认同，我们是极少数。但我以为，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这属于偷换概念。而毛泽东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了很多年，不断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洪水猛兽”的观念。在许多被毛“洗了脑”的人的心目中，从“偷鸡摸狗”到“贪腐奸淫”，即便是自古就有的种种“坏事”，都要归罪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而“腐败官僚”已无疑等同于“资产阶级”，因此，“反官僚”也就是要反“资产阶级”。这种民粹主义性质的偷换很容易迷惑人，危害也极大。

平心而论，要说“反官僚”，刘少奇搞的“四清”运动倒可以说是一场“反官僚”运动。刘“四清”只限于清查共产党内基层组织里“官员”的经济问题，这也就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但实际上，杨继绳先生说的那些“官民矛盾”和贪污腐败现象，那时在基层都存在，民众每时每刻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其中不乏类似迫害杨改兰一家自尽的肥己“村官”。而毛“文革”则是一场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的反“走资派”及其“附庸”的运动。从国家主席到小学校长，从党的干部到民主人士，从学术权威到普通知识分子，从科学家到资本家，从虔诚教徒到五类分子，以至从书画音乐到庙宇古墓，从瘦腿裤到高跟鞋，只要不合毛式“社会主义”的标准，全都“包圆”，叫做“封资修”的那一套，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除此之外，就是不许反那最大的“吃人官僚”他自己及其“四人帮”一伙。

可以说，刘“四清”还有点“反官僚”的意思，而毛“文革”与“反官僚”基本不沾边，这就是毛“文革”和刘“四清”的差别。

可是，现在一提“四清”就是刘少奇的“罪恶”，说他极“左”，“打击了一大片”，而“反官僚”的桂冠倒戴到毛泽东及其“文革”的头上去了。一些论客说他“与百姓同在”，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这种偷换很有“倾向性”啊！

总之，从总体上看，刘派不是“官僚”，而是“走资派”，文革也不是一场“反官僚”运动。我们坚持文革的宗旨还是“反走资派”，但毛文革“反走资派”完全反错了，“文革”是场伪革命。现在不管人们在感情上如何不喜欢刘派，但从理智上看，他们的“走资派”路线符合封建社会中国的实际情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代表着进步和光明；而毛“反走资派”是反动历史潮流，他成了“修正主义”和“反动派”。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文革“打倒了‘走资派’刘少奇”，好不好？对不对？答案是既不对，也不好。

看来，现在人们应当为“走资派”正名了。

是的，共产党内是有许多封建专制的“官僚”，包括毛泽东自己及其“四人帮”在内，他们“草菅人命”、腐败堕落，而现在还有更多。但“走资派”不等同于“官僚”，相反，他们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民主党派里更多，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因此，并不是很多官员能够配得上“走资派”这一光荣称谓的。当然，“走资派”们在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有些甚至很严重，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但他们的主张毕竟能够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道路，起码比毛式“社会主义”要现实得多，也好很多。这包括党的领袖刘少奇和彭德怀，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包括党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如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等。与他们为伍的，还

有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这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毛整得很惨，现在又被人骂作“官僚”或贬为“也不怎么样”！

因此，我们现在谈论“官僚”和“走资派”时，最好做一点区分，不要为了煽情或出气而“一锅煮”。

另外，现在搞“中国特色”的一帮人，也不配叫做“走资派”。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有“资本主义”的“躯壳”，没有“资本主义”的“灵魂”，而其中的贪腐官员更是一堆“行尸走肉”。我在《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

([http://www.azcolabs.com/xy\\_qinhui.html](http://www.azcolabs.com/xy_qinhui.html))中讲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只要没有他那“三要素”，与其说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怕倒是玷污了“资本主义”的名号。

话说回来，那现在为什么有人会造出“文革反‘官僚’”一说？为什么要拼命给毛泽东和自己戴上“反官僚”的桂冠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作为一位局外人，德国学者魏格林女士看得很清楚。在对比二战后德国民众的反省经验之后，她写道：“在经历过像文革那样不幸的历史事件之后，一个民族要重建自尊心，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所以各个记忆团体都无法对此历史事件作出一种全面的历史评价，而只能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竭力保护自身的利益。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有关文革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就好像是当年文革派性斗争的继续。在文革中还没有打完的仗，今天在人们的记忆中还在继续打。原来的造反派往往还在坚持他们在文革中所持的意见，并且千方百计为它争取正当性。”（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2006年）（见本刊 zk0605a）

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那越反思，就越想得出种种“理由”来替自己“造牌坊”。你想，“文革”中自己跟着毛“造反”，齐声唤，红太阳打倒刘少奇！现在既要否定毛，但又不能肯定刘，否则自己当年也不光彩，该怎么办？只有说是毛以“独裁”反对刘的“官僚”，是个顶好的出路了。这样一来，毛不对，刘也不对，文革中就我自己“造了‘官僚’的反”对，现在看来又还是我最高明！这“正当性”就是“牌坊”的意思。

经历过文革的人来研究文革，好处是熟悉历史，有切身体会，但共生的坏处是，可能会带有偏见。这就是德国学者魏格林女士所说的情形。

在《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

([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socialism.html](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socialism.html))一文里，我论述了为何不但应当否定文革中的毛泽东，连他前十七年所谓的“主导红线”，也是一条反历史规律而动的路线。因而，可以说，清华文革“群众政治”中所谓的“团四之争”，双方各执毛之一词，打得“天昏地暗”，毫无意义，他们无论是跟哪个毛泽东都是跟错了人。

而这里的悲剧在于，除了自相残杀之外，各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文革中实际上都是在做“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事，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推迟我国的现代化，尽管他们的初衷刚好相反。可以说，如果没有“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是搞不了“文化大革命”的，而否定“文革”就必须否定“红卫兵”和“造反派”，无论

是“彻底否定”，还是“基本否定”。对一些人来说，否定自己，这是一个很难正视和吞咽的苦果：为什么竟会是这样？

这正是一个现在“反思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这些话讲得有点刻薄和扫兴，但“民众”有时难道不就是这样子吗？二战后的德国人也曾反省自问，“我们怎么会跟了个希特勒？”没准过几年，又该轮到一些老美挠头叹气，“咕（Gee）！我们当初怎么选出了这么个货？”……谁知道呢？唉！民众和群氓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是专制的土壤”（黑格尔），愚昧又狂热的群氓乃独裁之台柱。

注：“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也就是土改以后刘少奇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

2017年2月

~~~~~

【亲历者言】

毛泽东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

• 徐景贤 •

（一）

这一章，想着重说说郭仁杰之死。

郭仁杰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分书记，也是写作班哲学组组长。调到写作班以前，就是一个有资历的干部。他是山东烟台人，贫农出身，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后来进入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解放区搞过地方工作。解放后进城到上海，先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担任系总支副书记，后被调到华东政法学院去做哲学教研组组长。他的革命经历、党龄都比我和朱永嘉长，所以写作班在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思想时决定成立一个哲学组，就把他从华东政法学院调来担任哲学组组长。

他为人直率、豪爽，表里如一，有什么意见都要说，而且有自己的独特的想法。比如说，在文革造反前他调到写作班后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这在当时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那时正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时候。他在学校里就坚持这个观点，到写作班来以后还是坚持。当然他说的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一面，而是说毛泽东思想在现阶段达到的高度还有局限性，还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突破，不断地提高。他的“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的命题在学校里曾受到过批判，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到写作班来以后，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对的，并且赞成他可以保留自己的见解。

◇ 郭仁杰成了市委写作班造反的带头人

自从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公布以后，复旦学生紧跟而上，也贴出很多大字报，逐步形成揭发复旦党委的一股力量。郭仁杰就从市委写作班返回到复旦去了。当时郭仁杰对复旦党委是不满的，他做过系总支副书记，算是中层干部，所以不能冲在前面。但他跟红卫兵造反派的关系很好，支持他们起来造复旦党委的反，而且在教师中是比较早支持学生造反的，所以他跟复旦红卫兵，特别是最早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红革会”（全称“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以复旦的大学生为骨干）这一派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开玩笑说：“你简直是‘红革会’的‘军师’了。”

“红革会”确实把他当成顾问，凡是重大的活动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在复旦学生、教师纷纷起来造反的时候，郭仁杰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当时校、系一级的党员干部受冲击的很多，他倒成了革命造反的一方。后来朱永嘉被复旦打成“牛鬼蛇神”的时候，也是他带了历史系的几个人，根据姚文元给我的电话指示，把朱永嘉救出来的。由于他是我们这批人中造反最早的一个，我们称他是“老造反”。

后来，他又带我去复旦看大字报，我称之为“留学”，推动我起来造反。哲学组的另外两人程绮华和谢宗范在他的策动下，成了写作班造反的中坚力量。郭仁杰把红卫兵的话转送给我：“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并用这个主题鼓动我打出市委机关造反的旗子。

市委写作班造反以后，他成为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二把手。当时市委机关联络组勤务组实际的排名是：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程绮华。朱永嘉当时曾被复旦打成“牛鬼蛇神”，还有点小辫子被人家抓在手里，不能担任造反的领导职务，所以实际上是郭仁杰在勤务组里辅助我，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开始时，机关联络站的全盘的工作都是由我跟郭仁杰商量，程绮华负责机关内部事务，王承龙负责对外联络。写作班造反要开全市大会时，由郭仁杰主持会议和筹备工作，我当时没有经验，会议怎么组织？主要批判哪些人？包括口号的提出，他都很细致地跟我商量。那时，我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自己的发言稿上，所以写作班的造反是他起了主要的作用。

“一月夺权”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来上海以后，郭仁杰全力以赴抓紧一月六日打倒市委大会的筹备工作。我记得，大会宣布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等三个通令都是他具体策划的，并由他和作家协会来的戴厚英和高玉蓉一起执笔起草。他在造反过程中一直是起着组织者的重要作用。

夺权以后，他和我一起商量怎样把大批判深入下去，我们共同设想搞一个电视斗争会，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电视斗争会上。这个电视斗争会在全中国也是一大创造。因为一个对市委领导的小范围的批斗会要让全市广大人民群众都来了解，单靠报纸是不行的。当时张春桥已经开禁了，说一月六日的大会他们要看电视。这样一下子把电视运用到批斗会上来。上海的电视斗争会有主题，比如说反对经济主义的，专门揭露市委领导人是刮经济主义妖风的罪魁祸首，然后把各种各样与“经济风”有关的曾经签过字的部、委、办、局的头头，都弄到会场上来，叫他们交待、揭发，拿出罪证，当场批判。我们设想把会议放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因为与外隔绝，把当权派拿到那里去批判秩序比较有保障，大会揭发到什么人，就把他拉上来要他交待、进行批判，气氛很热烈。当时电视机虽然没有在全市普及，但各单位都有电视机，大家可以在单位里集中收看。群众能看到在市一级的批斗会上，哪些人出来揭发，哪些人出来交待，哪些人属于态度比较恶劣、应该打倒，哪些人表现积极、准备解放出来，在电视斗争会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郭仁杰和我一起策划、主持了电视斗争会，但每次

主持他总是缩在后面，把我推到前面，照他的说法：“我这个人不要名，不想做官。”这样，他在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威信比较高。

第一场电视斗争会很轰动，我记得，斗争会开到一半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就打电话到会场说：“你们在批斗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一下。”我和郭仁杰就从上海展览馆乘专车直奔兴国路招待所，张、姚看了电视转播，说：“这样做很好。让他们狗咬狗，使他们内部产生矛盾，让各种人都出来表演，不要怕。”我跟郭仁杰得到他们的指令以后，重回会场，索性放开了：谁愿意上台揭发都可以上台，不加限制。这样，市委书记处的马天水、王少庸都上去揭发了，市委办公厅的主要领导，曹荻秋、陈丕显的秘书们都上台抢话筒，纷纷作为知情人站出来揭发，揭发的材料很有质量，有些材料我们事先都没有掌握。这一来，全场震动，全市轰动。斗争会以后，郭仁杰建议，把电视斗争会的内容出专刊发行，把会上所有的发言及反映会场情绪的场面、当权派的表现等照片都刊登出来，还配发评论。专刊卖三分钱一张，很畅销。有的人看了电视后觉得不过瘾，还要看细节；有的人没看到电视，都去买专刊报纸看，在上海一时“洛阳纸贵”。

但紧接着却发生了“一·二八炮打事件”，致使郭仁杰最终陷入了灭顶之灾。

◇ 张春桥密谈毛泽东对“红革会”的指示

关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红革会”等群众组织炮打张春桥、姚文元的事，我在《十年一梦》中已作了介绍，读者不妨参阅；这里单说说与郭仁杰有关的几件事。

同年三月间的一天晚上，张春桥把我和郭仁杰找到兴国路招待所，谈话的地点是在五号楼的客厅，姚文元没有参加，在场的还有张春桥的妻子文静。那天，张春桥看了几份市委机关联络站的简报，也看了市委机关联络站由郭仁杰、朱永嘉组织人编写的《“一·二八”炮打逆流大事记》，认为这些材料把“红革会”和有关组织炮打张春桥、姚文元的日程和细节写得很详细：年、月、日，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炮打经过，怎么组织反炮打，哪些人做了交待，怎么交待，写得明明白白。对此，张春桥很欣赏，并关心地问：“你们收集了很多材料，‘红革会’炮打的大体眉目出来了。最近的反逆流情况怎么样？”

这项工作是郭仁杰一手抓的，他原来就是“红革会”的顾问，又感到对于我被“红革会”绑架这件事，他也有责任，因此觉得由他把反逆流的事查清楚，是应该的。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后，“红革会”派人到北京去查问此事是否属实，当他们发现电报是真的时，就搞了一个请罪活动，各学校的“红革会”组织了卡车游行，打出标语：“‘红革会’战士向中央文革请罪”、“‘红革会’广大战士向上海人民请罪”。张春桥当时就对我们说：“红革会”广大战士无罪，不要搞这样的请罪活动。所以，我们在反炮打“逆流”的过程中，尽量让“红革会”战士解脱，只是让那几个头头出来作自我检查。

郭仁杰主持的大会，我去参加过一次，有“红革会”战士发言，批判“红革会”头头：复旦大学马立新、师范学院李功佐（女）等都是批判对象，最后我就根据张春桥的指示精神，发言说：“广大战士本身是无罪的，错的是少数头头。他们做了检查，我们表示欢迎。”

郭仁杰那天在兴国路招待所向张春桥汇报了各学校反对炮打“逆流”的情况，他说还组织了一个反逆流联络站，便于查清“红革会”头头的情况。少数头头最后准备给予解脱，宣布回到群众中去。其他“红三司”、“炮司”等几个卷进炮打不深的组织仍很活跃，郭仁杰主张应该实行红卫兵的统一大联合，将来再建立一个全市的统一的红卫兵组织。

张春桥认为：红卫兵运动最终要实行按班级、按学校的大联合，归口闹革命，复课闹革命，决不能继续发展分散的跨学校的组织，山头林立，各行其是。等到各学校实行了红卫兵的大联合，全市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时机就成熟了。

张春桥对我们前一阶段反炮打的工作点头表示认可。但那天他脸色很严肃，很严峻，他说：“你们的材料我已经看过了，但我总怀疑‘红革会’有背景。比如说，他们‘红革会’究竟与原市委的那些人有没有联系？有没有人在幕后指使他们？又比如说，中央文革来了特急电报后，‘红革会’的一些头头居然跑到东海舰队机关里去，用舰队的红色保密机向中央文革打电话，究竟是什么人给他们提供这种条件的？有一些头头又赶到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在中央文革的接待站里又有什么人表态同情他们？我总怀疑还有长胡子的人在幕后策划，这些事情好像都没有查清楚。”

张春桥说话的时候，文静在一旁插话：“当时杨西光在复旦大学扫厕所，那两天也不去扫了，活跃得很。”

张春桥接着说：“这次炮打就算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上次我跟文元一起到北京去汇报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毛主席很关心上海炮打这件事，主席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红革会这笔账还是要算的。’你们对这件事心中要有底。这次炮打，我认为至今有些事、有些人还没有查清。但是，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只对你们讲，你们不要外传。”

当天晚上，张春桥当场决定：让郭仁杰返回复旦主持学校的工作，整顿红革会的组织，并查明红革会炮打的幕后策划者。张春桥总怀疑是陈丕显等人在幕后挑动。

那天，我们想，我们已经把红卫兵解脱了，毛主席又说这笔账还是要算的，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两人回来后，感到这么重大的事情，光我们两人知道，操作起来有问题。所以我提议，是不是给联络站和写作班几个最核心的人传达一下？郭仁杰也同意了。这样，我和郭仁杰把程绮华、王承龙、吴瑞武、朱永嘉找来，在极小范围里给他们说了说，同时再三叮嘱只给你们几个人传达，不得外传。

◇ 郭仁杰同情“红革会”挨整

郭仁杰以市革会教卫组负责人的身份到复旦去主持工作，是一桩苦差事。他要求写作班历史组的吴瑞武和他一起去，吴不想去，就来找我。我只好对郭仁杰说不要勉强他。后来吴瑞武同意做郭仁杰的联络员，郭仁杰才肩负着毛泽东要算红革会这笔账的使命，单枪匹马地到复旦大学去了。

当时，张春桥对我们很信任，我至今也还相信：张春桥传达的毛泽东有关“红革会”的话是真实的，因为当时毛泽东对张、姚非常器重，而且姚文元后来也和我说过同样的内容。但是到后来，毛泽东的话在上海一部分红卫兵中传开了。我很奇怪，这么小范围里讲的话，怎么会外面流传呢？我一查，才发现因为郭仁杰跟“红革会”的一些头头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是他向他们透露的。

郭仁杰在造反的时候跟复旦“红革会”头头共同宣誓过：“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所以感情非常深厚。“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后，郭仁杰是恨铁不成钢。他刚

回复旦时，曾经斥责红革会的头头搞炮打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叛变投敌”。但当红革会的头头挨整以后，他又流露出对他们非常惋惜的情绪。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红革会”在里面没有一个委员，郭仁杰说，要是他们没犯错的话，“红革会”应该在里面占好几个席位了。另外，他一直认为“红革会”是老造反犯错误，应当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他在思想上同情“红革会”，希望他们能够东山再起。他当然是为他们好，但是忘了张春桥对我们两人的警告，把密谈的内容透露给了“红革会”，特别是复旦“红革会”的那些人。他不但把毛主席的讲话透露出去，还连续不断地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师范学院、上海铁道学院等“红革会”力量较强的单位，跟他们商议在市“红革会”解体以后，是不是要搞一个“红革会”市级联络站的问题。后来，真的搞起了一个全市性的红革会大批判联络站，“反逆流”的问题无疾而终。郭仁杰在外面活动的情况，被不断地反映到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层中来。

市革命委员会建立各组、办后，郭仁杰是教卫组领导核心之一，教卫组主要负责人是老干部陈琳瑚。郭仁杰很少留在教卫组，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各大学负责斗批工作，但他在没有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重新支持“红革会”东山再起，这个消息很快给两方面捕捉到了：一个是游雪涛小组，里面有反对郭仁杰的谭启泰等人，反映说郭仁杰在外面四出活动，与“红革会”那些人串连；第二是王承龙抓的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下面的联络组，专门出简讯的，把郭仁杰和“红革会”的动态在小范围的简讯上登了出来，简讯都是由文静定稿的，我也看到了。这些事情令我非常忧虑。

◇ 写作班“老战友”和郭仁杰集体谈话

我赶快跟程绮华、朱永嘉商量，说郭仁杰这样下去，一定要出事，而且会给我们大家惹事的。程绮华也感到了事态严重，说：“老郭毕竟和我们一起杀出来的，我们不能看着他制造麻烦，造成被动。”我们就把他请到荣昌路（后改德昌路）六十号专题写作组，程绮华、吴瑞武、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等原写作组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

我问他有没有把毛主席的讲话透露到外面去？为什么“红革会”都在议论？我说：“我到几个单位去开会，他们逼着问，毛主席有没有这个讲话，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是反革命？毛主席有没有说‘红革会’这笔帐是要算的？他们还到北京去核对这件事，春桥同志为此很恼火，我被搞得很被动，既不好说毛主席有这个指示，也不好说毛主席没有这个指示，我只好对他们说‘无可奉告’。”我说：“毛主席的话是在内部说的，春桥同志个别向我们交的底，你怎么可以捅到外面去？你这样做，‘红革会’的广大战士会对毛主席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他不得不承认，说只是提醒他们：“你们要注意，毛主席都讲了这样的话，不然的话，你们要倒霉的。”

我说：“你也不能用传达毛主席指示的这种形式去跟他们讲嘛。”郭仁杰承认自己不对。另外我问他有没有到各个学校“红革会”那里去说了许多同情老造反的话，有些人要变相成立“红革会”总部，设联络站，你也表态同意了？

郭仁杰显出一脸苦相，很尴尬，结结巴巴地说：“主要是同情他们，感到他们是我造反的老战友，现在却落得这样的处境。”

我说：“他们回去后，不也一样在学校掌权嘛。”

他说：“他们本来是全市有影响的大组织。”

我说：“现在打算用全市统一的红卫兵组织来代替各派红卫兵，而你这样做，完全是不对的。今后决不能再和‘红革会’头头暗中有串连，要公开地搞全市红卫兵的大联合。”

郭仁杰当时还同情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组织，“联司”已把矛头指向了市革会，郭仁杰却对“支联站”的人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天谈话时，我当面问郭仁杰：“你说的‘虎’是指什么人？”他竟然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指张春桥。

我和写作班的同伙们都倒抽了一口冷气，觉得他已经和我们分道扬镳了。但那天我们还是严肃而又耐心地劝他悬崖勒马。

他当时虽也在口头上答应，但已不能自拔，会后他到外面又和那些人接触，那些人也不断去找他，来往非常密切。

王承龙本来和郭仁杰不和，多次发生争执，现在正好抓住郭仁杰的把柄，他把郭仁杰的动向编了一期内部简报，包括他误传毛的指示，他和“红革会”联络，准备拉出市一级的组织等等，报给张春桥。张春桥大怒，说：“这简直不可容忍。机关内部竟有这么一个人！”

接着，王承龙在外面造舆论，“红革会”的对立派就在外面贴了很多大标语，称他是“郭小丑”，标语说：“郭小丑支持‘红革会’东山再起，绝没有好下场！”“彻底揭穿郭小丑的真实面目！”等等。

郭仁杰与市革命委员会教卫组的关系也搞得很僵，陈琳瑚批评他，郭仁杰认为自己是老造反，陈琳瑚是自己把他解放出来的，所以不服帖，顶撞陈琳瑚。在市革命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又与王承龙冲突起来。这样，教卫组和办公室两个机构都要求批判郭仁杰，逼我表态，他们说：“郭仁杰走到这地步，春桥同志已发火了，必须批。”

我心里是想保他的，但是我如果不批判他，也有悖于张春桥的意思。所以我同意开一个批判会，当时在市委党校的底层小礼堂，有一两百人参加，都是机关内部各部委的造反队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各组办也派人参加。最后我发言，希望他悬崖勒马，不要走得更远。

同时，各大学也纷纷开“郭小丑”的批判会，我听说复旦大学“红三司”开郭仁杰批判会时，红卫兵动手打了郭仁杰。我知道“红三司”是王承龙支持的，就对王承龙讲：“今后批斗会上不能搞武斗。”王承龙性格粗暴，在这事上对我很不满意，他对我瞪起眼睛，喉咙嘶哑着说：“群众有气嘛，打几下有什么关系啊！”可见他是支持动手的。

◇ 郭仁杰被人揪走了

我觉得这样弄下去很麻烦，对郭仁杰来说凶多吉少。正在这时，郭仁杰又有几件事让人抓住了把柄：他跟黄浦区京剧团的一个女编剧，他的山东老乡，过去有过交往，人家说两人有暧昧关系。同时，又传说他在复旦大学与一个女教师有男女问题，也被传得沸沸扬扬。有人就要追查郭仁杰的“流氓罪”。

这样一来，我觉得很难保他。那时“红三司”准备把他揪走。我对程绮华说：“你给他在校找个房间，叫他写检查。不要到外面去。”他就在市委机关联络站里写检查，实际上是想把他保护起来。不久，他的胆结石病发作了，疼痛难忍。程绮华心肠软，想着如果随便把他送到一个什么医院去，很快会被人家揪走，于是就给他用了一个化名偷偷地送到上海市

公费医院去住院。这件事她没有告诉王承龙，但对我讲过，原写作班的几个人也知道，对外是保密的。

谁知道，原写作班一个人对郭仁杰有意见，他的妻子是“红三司”观点的，他回去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妻子在上海工学院工作，而“红三司”的头头张某正好是工学院的，这样，他们就得到了郭仁杰住院的信息。

一天，“红三司”的人乘了一辆卡车，冲到延安西路上的上海市公费医院，挨铺搜查，听说当时郭仁杰用床单蒙着脸，结果被人家把床单揭开，发现了他，“红三司”就把他绑走了。

王承龙得到消息，拍着手，哈哈大笑，对我幸灾乐祸地道：“哈哈，原来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现在有好戏看了！”

郭仁杰被抢走后，一直没有音信，也不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我知道王承龙肯定是知道的，就问他：“郭仁杰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人不见了，应该派人找一找。”

王承龙对我神秘地笑笑：“接受群众的审查嘛！”

当时，王承龙和王少庸两人分管市革命委员会专案办公室，前面我对他封锁了郭仁杰到公费医院住院的事，现在轮到他对我也封锁了郭的消息。

一天晚上，我在市革会康平路大院办公室值班时，办公室有人报告，说：“上海工学院‘红三司’负责人张某，送一份绝密件来。一定要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亲收。”

我想，既然是送绝密件来，我当然可以收的。我就让办公室的人把它拿来，原来这是一份《专案审查报告》，是送给王少庸和王承龙审阅的。里面有郭仁杰和各大专院校“红革会”头头的接触情况，还有下一阶段准备深入追查郭仁杰男女关系问题的打算。署名是“一〇二专案组”。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对郭仁杰的问题已经设立了一个专案组了。当时市革会专案办有两种专案：一种由市里直接抓的，几个市级领导的专案，如陈丕显专案组、曹荻秋专案组，以及上海特别重大的案件；一种是用群众专案的形式，先由各群众组织自己先设专案组，然后到市专案办来挂钩。这个专门审查郭仁杰的“一〇二专案组”属于第二种情况，即由他们自己审查，然后把审查的经过情况以及审查结果向负责专案的王少庸和王承龙汇报。至于郭仁杰关在什么地方，报告中没有透露。不过，既然送报告来的是“红三司”头头张某，我知道，出面搞专案的一定是上海“红三司”那批人，幕后指挥的就是王承龙。这是毫无疑问的。

◇ 郭仁杰在专案组挨毒打

我当时对郭仁杰的心态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他毕竟是一起造反的老战友，错误再大，也不能往死里整；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泄露张春桥跟我们的密谈，对外透露毛主席的内部讲话等，实在难以原谅。我希望张春桥看到这类情况，能够出面保护他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文汇报》记者摸到了“红三司”一些人刑讯逼供郭仁杰的情况。情况写得很详细，说郭仁杰被关在一个密室里，他走路的时候，腿已经一瘸一拐，情况是用现场记录的形式写的：

问：“你跟黄浦京剧团某某人的男女关系怎么样？交待！”

郭仁杰答：“我已经讲过了，没什么。”“嘭”一拳，郭仁杰被打倒了。

又问：“你除了和这个人的不正当关系以外，还有什么人？交待！”

郭仁杰：“再没有什么人了。”讯问者把郭仁杰打翻到桌子下面去。

问一句，答一句，就打一下，甚至还记录下摔了多少次。

最后是用鞭子抽郭仁杰的屁股，抽了几十鞭，把皮肉都打烂了。

郭仁杰发出阵阵惨叫，也都记录在案。

我也晓得，这里面夹杂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上海两大学生组织的派性。“红三司”和“红革会”是对立派，“红革会”掌权的时候压过“红三司”，“红三司”翻身后，就把对“红革会”的气出在郭仁杰身上。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未必见得对郭仁杰本身有多大仇恨，但居然用严重的刑讯逼供的方式来折磨郭仁杰，这是在发泄一种派性。

我看了材料后，感到很不安，心想要出事了，这样打下去岂不要出人命？而且郭仁杰即使有男女关系的生活问题，也总是罪不致死吧，何况专案审查的重点不应是生活作风问题。但当时专案是王少庸和王承龙主管的，张春桥还指定由王少庸主持市革会的工作，我觉得很不好办，只希望张春桥对此事能表个态。我就把打郭仁杰的材料送到张春桥那里，张春桥对情况是每期必看的，而且对报社送去的情况看得尤其仔细。我希望他能够写一个批语，这样，郭仁杰就可以得救了。但是情况送上去，没有任何回音。

这时又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的机要秘书，叫王钢，是从上海社科院调来的，跟我们一起在市委写作班造反。他跟我和郭仁杰、朱永嘉等人都是很熟的。他负责管我的机密文件，也就看到了报社送来的关于殴打郭仁杰的这份材料。过了两天，他忽然失踪了。我身边的人怎么会失踪呢？我叫办公室工作人员赶快到他家去找他的妻子。王钢的妻子当时在县里工作，问她，她才说出王钢原来在社科院也有过男女关系的问题。王钢为人非常胆小，他一看郭仁杰给人揪去打得这么厉害，心里很害怕。他曾经对妻子说：老郭给人打得这么厉害，怎么办？失踪前，据说王钢曾打电话找我，因为我在外面开会，没有找到，他就找写作班的陈冀德，告诉她：“你跟老徐说一下，我有一串钥匙，留在办公室里。还有一辆自行车放在康平路。”陈冀德很奇怪，一时反应不过来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以后，王钢这个人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王承龙知道后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说王钢携带机密文件潜逃。他还叫上海市公安局下达通缉令，在通缉布告上刊登了一张照片，说上海市某负责同志的机要秘书失踪。很明显，是借机损害我的声誉。后来又叫机要处来查，是不是少了文件？结果文件一份也没少。王钢人很老实，平时言语很少。我分析，他害怕人家要算他男女关系的老账，所以跟陈冀德交代了后事以后，就找个地方自杀了。后来海运局曾经查过出海的轮船，上船的时候卖出过多少车票，以后清点乘客人数的时候，曾经发现人少了，我们怀疑：王钢可能是乘长江轮出海时投海了，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尸体。为这事，王承龙叫市革会办公室查了很久，弄得我有一个时期连管文件的秘书都没有，我自己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很接近的一个同志，怎么跟我连招呼都不打就消失了。由此可见郭仁杰的事情对王钢的冲击是很大的。

这样一来，我连自己的秘书都管不住，失踪了。那末，在郭仁杰的事情上，我更不好说什么了。

◇ 郭仁杰终于跳楼自尽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的晚上，市革会领导成员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会，卢湾区公安分局来电话紧急报告说：关在他们那里的郭仁杰乘红卫兵提审他的机会，对看守他的人说要一杯开水，把红卫兵支到室外，等红卫兵一走出门，他就把门关上，从二楼窗户跳下去，顿时头部着地，脑壳破裂，气绝身亡。

我也闹不清楚，他怎么给关到区公安局去了。那天晚上，我很震动。王少庸、我、王承龙都在电话纪录单上圈阅。王承龙圈阅的时候说：“畏罪自杀，通知家属，火葬。把这事情报告春桥同志。”王承龙搞这个专案组的本身，就是要置人死地的。张春桥肯定不会出面表态，也不会说任何保护的话。

实际上，郭仁杰是上海的干部中最早跟着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起来造反的人，最后却死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文革结束以后，人家来问我郭仁杰案的全过程，而且对我说：郭仁杰属于造反派，不好平反，所以至今也没有个结论。

从我内心来说，一个支持我的“老战友”，由于违背张春桥的意志，被摧残而死，我没有办法保护他，为此我一直感到不安。我认为，郭仁杰他不迷恋权力，不想当官，根本不存在争权的问题。但他这么死了，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悲剧。悲剧在于他起来造反，卷进这场漩涡以后，他就难以自拔了。文革中一些掌权的人不光对“走资派”、当权派下手很厉害，就是对造反派内部的“战友”，假如一旦成为异端，马上就采取打击、剪除的做法，手段也是很残忍的。

郭仁杰除了支持“红革会”以外，他又积极支持上海柴油机厂“联司”，这也是他挨整、受打击的主要原因之一。“联司”不断到市里告状的时候，郭仁杰代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接待过。王洪文开始时也让“联司”与“工总司”挂钩，承认这个组织，到后来感到“联司”不符合他们“工总司”的观点，就打压“联司”。王承龙是反对“联司”的，我当时看到“联司”反对市革会，对这个组织也非常恼火。郭仁杰接待“联司”的时候，说了一点同情的话，他感到“联司”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压的。郭仁杰对受压的人总是很同情，他在复旦的时候，红卫兵受复旦党委压，他支持红卫兵造反；后来“红革会”受压，他又支持“红革会”；这时，“联司”受委屈，到联络站来反映，他又多次表示同情。我对他说：“你不要搅到里面去，你一插手，事情就复杂了。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负责人，一派支持这个，一派支持那个，这不是要闹出大问题了。我们的方针只能是联合，只有一个方针，不好支持哪一派。”他不同意我的观点。郭仁杰支持“联司”的材料又给王承龙和游雪涛弄到简报里去，都送给张春桥看过，张春桥为什么不表态保护郭仁杰，与这件事也有关系。

郭仁杰被逼死亡以前，曾经留给我一封信，是用钢笔写在横格纸练习簿上的，大意说：你多次劝我对很多事情不要随意表态，我没有听，现在想来，你的意见是对的，可惜已经来不及了……郭仁杰就这样地走了。

我想，就算他当时活下来了，按照他那始终同情受压人们的性格，在文革中难免会不断地得罪一些人，最后还是不得善终的。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第十章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